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文史研究的巨大进步,在理论创新、方法变化和领域开拓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成绩。其间原因很多,我只想指出一点,世界各国的公私藏书都能为学者所阅读利用,即使最传统的经史之学,现在学者能看到的文献较前人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同时,古籍的大量影印使珍本秘籍成为学者的案头常备书。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实业人士,投入古籍电子文本或资料库的制作建设,已有的成绩使学者获益巨大,这是众所周知的。

古籍电子文本不仅查阅、剪贴方便,而且能作逐字逐句的检索,改变了传统学术靠记诵和个人资料积累的习惯,必将对文史研究带来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其中如汉语史(特别是文字训诂学)、古籍辑逸和训释,以及古代人事、典籍、制度、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得益最为直接。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提出重编《全唐诗》之举,只能动员学生一句一句抄卡片,再费大量人力排出,费力多而收效微。我在二十年前作唐诗辑逸,也因《全唐诗》不能检索而留下许多缺憾。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解决了。相信不要太久,收罗几万种基本典籍的可全文检索的古籍库必能建成,传统国学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的学者因此而断言,做文献资料工作的今后将失去意义,以文本校订、诠释、考证为主的传统文史之学也将逐渐失去价值。对此,我仅表示部分的赞同,即传

濠上漫与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史之学

■ 陈尚君



古籍数字化在网络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文献的使用效率

统文史之学应利用网络时代的种种便捷,提升学术层次,改进研究方法。而就现状来说,各种古籍电子文本或资料库的建设常见的通病,正在于重视信息技术而忽略学术质量。由于文本遴选未必最佳,校勘未臻精善,校对又常草率,适应一般读者需要而将许多学术层面的内容删去,加上因繁简互换、内码错乱等原因,古籍电子文本虽给大家以便利,但如不复核书本文献,一般还很难为学者放心地引用。许多古籍电子文本还仅停留在可供烹制学术快餐的需求层面上,一些制作者不免有较多出于商业利益方面的考虑。我们在享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不免又有一种忧虑。近年因《四库全书》的普及,现在的期刊

论文到各高校博士论文,常不加区分地都用《四库全书》本,其实从文本来讲,《四库全书》本有很好的,有的仅可备一本,也有相当部分改窜太多,完全不能用。

古籍电子文本或资料库在进一步大发展后,如不在学术质量上有非常高的追求,很可能造成一场新的灾难。举例来说,《全唐诗》是以明末清初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仓促编成的一部错误很多的经典大书,学术界对其所作的考订补录极其丰富,问题都弄清楚了,但到现在为止海峡两岸制作的《全唐诗》电子文本已不下十多种,对学术界已有的成绩基本没有吸取,而且多半仅录唐诗白文,学术质量远落后于清刊本。即便是近二十年最好的两部大型断代

文学全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宋诗》,由于仍有相当部分的书缺收,又都是在典籍无法通检的时期编成的,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讹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此来说,我认为网络文献的普及必将带动传统文史之学的飞跃发展,而古籍电子文本或资料库的建设,尤其应该更多地吸取传统文献考据之学的成绩,与有关学者的工作相结合,上升到更高的境界。由于网络文献独具的动态特征,对新成果的吸取可以更及时,更准确,更便于为多数人了解,不必如书本文献那样一旦付型,轻易不会再版,得到机会修订也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还以《全唐诗》为例来说,保存清编本面貌的可以是一种文本,而今本则应做到:1. 在文本上,能反映一首诗在历代各种文本中的面貌;2. 收诗全备,后出新见的应陆续予以补出;3. 前人已有的研究,应能有指示联接。如同杀毒软件不断有升级换代一样,《全唐诗》也可以不断升级换代。

附记:以上文字写于2002年9月19日,从未发表,存于研究生文档中,偶然找到。我于1997年底接任复旦中文系主任,立即给全系教师发钱买电脑,鼓励改变

写作习惯,但自己却到2001年初方学会电脑,5月初方写成第一篇文章。此文写于其后一年多,对网络与电脑写作都所知甚浅,似乎即写感受,倒也有一些真诚之见。有些预言,许多后来多应验了,有些仍未变,如古籍电子库的学术质量。认为数据库有便于炮制学术快餐,而无法满足高层次学术研究的要求,则目前有变有不变。当时我与国内一些学者合作做新编全部唐诗的工作,偶陷僵局,但还没有破裂,仍希望能将全书完成。当时我还完全没有用电子文本作古籍整理的经验,四年后即2006年作唐前诗的校订,仍复如此,直到两年后方改变看法。但当时我已经朦胧地感到,利用网络随时可以修改的优点,利用现代科技可以同时打开成千上万个文件,可以在网上公开,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学者参与《全唐诗》的校订,不断升级换代,希望能完成全书修订。现在看,一些想法是超前的,稍作改变可以实行。我近十年作《全唐诗》新写定本,即在电脑中开了一万三千多个文件,每日不断改写订补,不过没有上网,别人也看不到。一些想法真的很幼稚。如果真在网上操作,每天会收到大量点赞与谩骂,让人应接不暇。自己的新发现,很快就会被别人窃取。如果费十年时间,终于大功告竣,还没等我回过气来,全书已经署上别人的名字出版了。好在当年仅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自己已经全部忘记。偶见旧文,稍存感慨,略记始末,立此存照。

2017年7月6日附记

我与杨老素未谋面,论年龄他是长我一辈的人。但我手头有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给我的两封亲笔长信。

1966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准备升学时,高考取消,只得赋闲在家。多亏先父留下一箱旧书,中英文都有,词典尤其完备。这些书大多有年头了,纸张泛黄变脆,霉痕斑驳。仅有数册较新的书,其中就有杨宪益翻译的英文版《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回想起来,我跟杨家好像特别有缘,因为其中还有英文原版《呼啸山庄》及杨宪益妹妹杨苾的优秀中文译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上班。偶尔走过福州路外文书店,除了英文版“红宝书”及“样板戏”剧本,柜台里仅见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本书:《儒林外史》和彩色连环画《王贵与李香香》,装帧精美,非常诱人。我一见之下也斐然有译述之意,于是发奋研究中译英。《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自然成了我的范本。杨宪益的译文信而达,让我受益匪浅。他尽可能依原文语序(有时甚至于标点)来翻译,译文依旧流畅。

研读杨宪益译文时,居然发现两处小疏忽。其一是他翻译鲁迅《呐喊自序》“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自缢死过一个女人”那句里,该用 hanged 而用了 hung。那纯属疏忽。我虽年少自负,有志于从事中译英,其奈非科班出身何?我心得再多,可惜说与旁人浑不解,乏人赏识。所以我想借此结识译界权威杨宪益,一则可以讨教,二则希望得到他对我英文水平的认可。1974年4月初,我用家里的老爷打字机写了英文信寄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并附空白信封与邮票。然后就耐心等待。

忽一日,收到先生手写的中文回信,大喜过望。他非但未怪我小子出言无状,

我所认识的杨宪益先生

■ 曹山



杨宪益先生

还不惮其烦回答我的全部问题。他谦称自己“算不上专家”。关于平时使用什么字典,他说“我个人是不大依靠字典的,手头只用一本英文的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明牛津辞典》),时常翻一翻。遇到专门词汇或科技方面自己不懂的东西,就查外国的百科全书,如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指出的那个小疏忽,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解释说:“我的翻译《鲁迅选集》四卷本,当时是在很短时间赶出来的,错误不少。”我家两本确是1954年初版本。他还说:“关于翻译诗词之类,原文如比较含混,有多种含意,我认为应尽可能保持其风格,但同时又要使读者能够看懂。翻译原则首先是信达,要忠实于原文让读者能懂,但

文学翻译又要尽可能反映出原作的多种含意和精神,如何能作到,这点就看译者能力了。”

先生接着说:“在文学翻译上,每人表达方法都会不尽相同,这是无法加以硬性规定的。译中国诗词,要保存原作的节奏感和尾韵等,严格说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两种语言不同,读者对音乐的感受也不同。在诗的翻译上,我看很难说怎样作最好,原则也就是要忠实于原作,同时尽可能把原作的精神表达过去,用不用韵还是次要的。关于您提出的《智取威虎山》的译文中 Baby's Ma 一词的问题,那篇不是我译的,是一位美国同志沙博理译的。有人喜欢直译一些中国说法,觉得那样更能有中国味道。有人喜欢这样,有些人不习惯,见仁见智,这就很难说了。”在那剧本里猎户老常管老婆叫“孩子他妈”,英文版里是 Baby's Ma。照此直译,那北方口语里“他叔”之类的称呼,是否可译成 His Uncle?我觉得有点滑稽,在信里提出疑问,才有杨先生上面的解释。

杨先生还透露了《红楼梦》的翻译进程,“现在我爱人在修改译文,预备分三册出版。”最后他鼓励我,“您的英文表达能力是很不错的”,还不忘叮嘱“以后写信不必附信封和邮票”。

一年后我又去信请教问题。其一是林语堂翻译的明代作家蒋坦《秋灯琐忆》里有一段话,“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之

一二耳”,我不太明白这段译文。先生答复说:“林语堂翻译的那句话是有些毛病,此人英文是不错的,但写得很潦草,容易出错。我看原文意思只能解释为睡觉占去一半时间,愁病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幼儿与老年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

前面第一封信上谈起汉英字典时杨先生说,“林语堂也编过一本,内容相当杂,编的很草率,也不够好”。最后说,“看来您对英文翻译写作很爱好”,“您如有时间想作些翻译,可同图书社联系”。他希望我“能配合当前国家及社会需要,能利用你的专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一些工作”。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生附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字条,相当于推荐信,大意是:我认为曹山同志有能力从事中翻英工作。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为文学青年甘当孺子牛的风范。无奈那时我在里弄生产组打工,即使改革开放后《新英汉词典》组招聘,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考试,我所在街道依旧拒绝放人。直到两三年后人事政策改变,我才被招聘进上海外贸学院教翻译课程。一天,班上有个学生说她父亲在上海外语学院教书,想看看杨宪益的推荐信。谁知拿去后被弄丢了,留下那两封信好比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至今什袭而藏。

似水流年,转瞬过了四十余春,杨老已于七年前谢世。我去信那年,他与戴乃迪夫人身陷囹圄多年后刚恢复自由,他们的爱子正患重疾,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就在那种情况下,他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不但耐心解答问题,分享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竭力提携,鼓励我多作贡献。而今我也是蹒跚老翁,看到先生手泽,想起先生当年的古道热肠,既感激又惭愧。